

# 榜样的建构与消解：1949年以来台湾地区张季鸾与《大公报》形象流变考察

俞凡 杨帆

## 摘要

榜样形象对新闻从业者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形象往往是历史上成功的先驱人物及组织，这些无法被直接感知的形塑一般是通过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两种渠道完成，并内化为受者行动的指南。同时，这种形塑还会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本文通过对1949年以来台湾地区新记《大公报》与张季鸾形象流变的梳理，力图揭示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当政府对社会有较强的控制力时，这种形塑会严格遵循政府设定的轨道；当这种控制力削弱时，这种形塑就会偏离政府的轨道，更贴近被形塑者对这一职业的形象，进而消解政府塑造的形象，甚至将整个群体的认识导向传统体系的对立面；而无论政府的形塑还是民间的偏离，都是对历史记忆某个侧面的片面强调，只有建立在真实而全面的历史事实上的记忆，才是真正应当努力的方向。

## 关键词

榜样塑造、形象流变、张季鸾、新记《大公报》、台湾

## 作者简介

俞凡，男，1979—，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电邮：yufan@sdu.edu.cn。

杨帆，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电邮：yffunny168@126.com。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学刊为中心的新闻学术思想史研究”（项目编号：18BXW017）的阶段性成果。

##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Model: An Analysis of Ta Kung Pao and Zhang Ji-luan Studies in Taiwan since 1949

YU Fan YANG Fan

## Abstract

Model image, often the image of pioneers and organizations that have been historically successful, has important effects on journalists. Though can not be directly perceived, they

are usually shaped through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and resorted to recipients' collective memory which becomes inherited guide to their action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also play a part in that process.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changing images of Ta Kung Pao and Zhang Ji-luan in Taiwan since 1949,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m. When government has strong control on society, model image construction strictly follows official manner.; when such control is weakened, model image will deviate from government's expectation and is more likely to concede to model's imagination of the profession. Furthermore, it will deconstruct its official counterpart and even direct collective memory to the opposite side against conventional pattern. Images deriving from both conditions are one-sided emphasis on historical memory. It is images based on reliable and comprehensive historical facts that people should strive to pursue.

### Keywords

Model shape, Image change, Zhang Ji-luan, Ta Kung Pao, Taiwan

### Authors

Yu Fan is a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Email:yufan@sdu.edu.cn.

Yang Fan is a doctoral student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in 2019.Email:yffunny168@126.com.

This article is a phased outcome of the 2018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and Thoughts Centered on Academic Journals" (18BXW017).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对身边榜样人物的学习，刺激主体人的道德动因，在人的深层世界产生思想共鸣和情感反应（孙泊，2016：4），从而达到“见贤思齐”的效果。对于那些与我们同处一个时代的榜样，我们有可能通过直接的接触来加以学习；而对于那些历史上的榜样，我们一般只能通过社会对他们的形象塑造来达到学习的目的。社会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叙述，为我们塑造一个“可以追溯的过去”，使这些与我们时空远隔的人物的形象变得可以感知，从而使得我们可以“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关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康纳顿，1989/2000：导论2），这在强调历史传承的中华文化圈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作为社会行业的一种，历史榜样对于大众传媒业者（以下简称“传媒业者”）同样有着巨大的影响。据周葆华等人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针对全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的调查显示，在“你心目中的典范新闻从业者”题目中，受访者提名的前10位中有范长江、普利策、邹韬奋、邵飘萍4位历史人物，分别位列第2、6、7、10位（周葆

华,龚萌菡,寇志红,2014);而在2016年进行的同类调查中,范长江、邹韬奋、普利策仍然分列第3、4、6位(周葆华,查建琨,2017)。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人类动因是在一个包含三元交互因果关系的相互依赖的因果结构中发挥作用的。在这个结构中,行为、外在环境与以认知、情感和生理事件存在的内在个人因素作为双向相互影响的互动决定要素都起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三者具有相同的强度,同时某一原因性因素起作用的时间还会存在滞差(班杜拉,1997/2003:7-8)。我们认为,就一般意义而言,传媒业者心目中历史榜样的形象来自于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两个渠道的共同塑造。就前者而言,这种塑造首先来自于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的专业教育,其次则是新闻工作实践中前辈的言传身教,也就是蒂斯所谓的“专业人员与初学者”和“师傅带徒弟”的两个方面(Teece等,1997)。就后者而言,这种塑造主要来自于大众传媒对这一榜样的叙述、挖掘、解读与评价。二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这些榜样形象在某个特定社会时期的具体表现。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由于大众传媒业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这种塑造往往会受到社会政治环境特别是政府意志的影响,这在威权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威权社会中官方审定的教科书与服庸官方意识形态(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教师不断地将“正确的历史”灌输给学生,而通常学生也无法获知与之相悖的声音——这就使得一元化的正误观容易形成。但是这种“正确的历史”往往是被“蓄意歪曲”的(哈布瓦赫,1992/2002:225),那些不为官方所喜的历史往往被刻意隐藏。然而,“记忆是由社会群体所塑造的。记忆固然是个人的事情,……但却是社会群体决定了什么是‘值得记忆的’以及它应当以何种方式被记住。”(Burke,1997:44)研究者会根据社会需要不断调整其关注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角度,而学生在进入新闻行业以后也会根据自己的工作实际不断地重新审视乃至修订自己从学校里获得的关于历史的记忆。由于威权政体“并不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没有一套完整的、有系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体系,作为其运作的依据”(孙代尧,2003:5),所以这种调整和修订最初往往是在官方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但随着他们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也就越来越脱离既有的轨道,从而导致被刻意隐藏的另一面被发现、发掘、发声。当官方控制削弱乃至解体之时,那些“另一面”便会被放大、被追捧,从而在很短的时间里消解官方长时间苦心经营起来的榜样形象体系,甚至会使整个群体的记忆走向传统记忆体系的对立面——至少是对其置之不理,从而形成新的“政治正确”。然而,这种新诞生的榜样形象体系却往往会被新崛起的政治势力操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滑入民粹的泥潭。传统形象的塑造者们会对这种趋势进行抗争,但往往徒劳无功。

1949年以来我国台湾地区对张季鸾及其主持下的新记《大公报》（以下简称《大公报》）形象塑造的流变，很好地诠释了上述过程。根据台湾学者的划分，战后台湾“民主转型”的历程大致可分为古典威权时期（上世纪50—70年代初，后文“上世纪”不再注明）、改革威权时期（70年代初—1987）、改革威权到民粹威权的过渡时期（1987—1993）、民粹威权时期（1993—2000）和后威权时期（2000以后）（郭中军，2014：17—18）。以此标准衡量台湾地区二者形象的流变，我们不难发现，在50—70年代，研究者多着力强调他们历史上“拥蒋”“反共”的“贡献”；在70—80年代，研究者开始关注他们对新闻自由和民权的呼吁；在90年代，除了少数几个古稀之年的学者还在研究和呼吁之外，他们已经开始被边缘化，“本土研究”逐渐兴起；而到了2000年以后，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已经逐渐淡出了台湾社会的视野。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战后台湾社会的变化。

通过对于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除了90年代初极特殊的昙花一现之外，张季鸾与《大公报》的形象几乎从未出现在台湾地区的大众传媒上，而仅仅停留在新闻学杂志、教科书等专业媒体上，易言之，他们从未成为像大陆的雷锋一样的全民榜样，而仅仅是传媒业的行业榜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形塑与社会环境毫无关系。由于大众传媒业与社会的特殊关系，政府为这一行业塑造一个榜样，其目的便在于培养一批符合自己需要的传媒业者，并将自己推崇与倡导的理念通过他们传播到社会大众。所以，本文以1949年以来台湾地区对二者形象塑造的流变为主线，致力于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张季鸾与《大公报》是如何成为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传媒业的榜样的？他们在各个时期的形象是如何被塑造的？2.这种形象是如何被接受的，又如何作用于业者的行动？3.这种塑造和接受，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如何？又经历了怎样的流变？

### 一、“拥蒋反共”：50—70年代官方主导下的形象塑造

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逃台湾，翌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美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台海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美国不仅（向台湾）提供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援助，更提供各项学术与文化交流的经费与机会，引领欧美文化思潮输入台湾的知识界。”（吴翎君，2012：109）其目的便是要通过文化宣传等手段，维护蒋政权的合法性地位，宣扬反共意识形态，将新中国描绘为非法政权，并将台湾打造为“海外华人的心灵故乡”（向芬，2017）。这些政策与急于解决合法性危机，“光复大陆国土”的蒋政权的需要恰好契合，于是，自1950年起，以“反共抗俄”为核心的“国策”在台湾正式确立。

但是，这一“国策”要得到台湾人民的认可却不那么容易，台湾沦陷已有50年，中青年一代普遍在日式教育下长大，再加上“二二八”事件的影响，对祖国的认同相对淡漠；蒋政府坐拥巨大的军事、经济优势，却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在大陆迅速崩溃，其合法性自然会受到严重质疑；同时，台湾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日本政府的高压政策使得共产党一直难以开展活动，而苏联也从未在二战中参与太平洋战场的战事，这就使得一般台湾民众对蒋所树立的“共匪”和“苏俄”两大敌人缺乏体认感。所以，在蒋政府看来，要尽快完成“反共复国”大业，就必须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以迅速凝聚社会，增强政府的社会动员力。“要使每个人为这个单一体系（即社会计划）服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哈耶克，1944/1997：146）为此，蒋政府除了在台实行包括长时期“戒严”在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以外，还通过“统制”与“倡导”两种手段，建立以“反共抗俄”为核心的“三民主义文艺体系”。（张道藩，1954）而对以大专院校新闻院系师生为主体的未来媒体从业人员进行符合官方意识形态需要的形塑，也成为了其中的重要一环。

在这场形塑运动中，张季鸾和他主持的《大公报》由于具有四个特殊的优势，成为了独一无二的重要符号。首先，张从未加入国民党，亦从未担任任何官职，而《大公报》更是人所共知的“民间报纸”，这就天然地与政府撇清了关系；其次，张在世时名动天下，又与蒋有着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这在与他同时代的民营报人中可谓独一无二；再次，张与他主持的《大公报》一向对中共观感不佳，不仅多次明确声明认为共产主义不适于中国，更曾亲自上阵与《新华日报》论战；最后，张主持的《大公报》曾于1941年4月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这不仅是中国报纸首度获此殊荣，在50年代台湾处于西方阵营文化冷战前沿的背景下，更是一种特殊的荣誉。所以，在50-70年代，张与《大公报》成为了台湾地区着力塑造的传媒业者的重要榜样，风头一时无两。

审视这一时期的相关叙述，我们不难发现，“拥蒋”与“反共”是贯穿其中的两大主题。这种叙述首先来自曾经的国民党当局主管新闻宣传的高级官员，如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委员、《中央周刊》社长的刘光炎（1952）在回忆大后方战时新闻界情况时云：“大公报是无党无派的报纸，但在那时却很能为国家民族着想。例如共匪不守信义，攻陷长春，大公报就著‘哀长春’以斥之。大公报所以为人爱好，就是为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妥协，不过这完全得力于张季鸾先生。”

这种叙述很快反映到了新闻史教学中，1966年，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出版，自此至90年代，此书成为台湾各大学新闻学系的法定教材。本书主编曾虚白曾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兼第四组（即原中央宣传部）主任、“中央通讯

社”社长等职，该书采取各人分章撰写，最终由曾统稿而成，参与撰写者既有赖光临、李瞻等新闻学界的著名学者，也有张玉法、亓冰峰等著名历史学家。本书主编的特殊身份及它特别的编写体例，使它成为了这一时期台湾地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中国新闻史教学的钦定圭臬。该书对《大公报》和张季鸾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仅以书后词条索引数论，《大公报》与张季鸾各有16条与10条，分列第3与第8位，而如果把时间限定在1926—1941年间，则二者的数目都高居榜首。不仅如此，该书对二者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总论》中，曾赞扬《大公报》“创造了企业与政论合流的典型”，张“精神足为报人的表率”，（曾虚白，1966：15）这就给全书的评价定了个调子，此后各章均徇此议，如张玉法云：

在名义上，吴氏为董事长兼社长，张氏为总编辑，胡氏为总经理。事实上，他们三位一体，和衷共济，使大公报的组织日益完善，业务日益进展。大公报最大的特征是言论稳健，具影响力。……该报的社训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言论大公无私，深获读者同情（曾虚白，1966：373）。

常崇宝亦云：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在全国四版同时发刊，影响力颇大，尤以对一般知识分子为然。其立场最初尚称公允，后来主持大权落入野心者王芸生手中，言论立场日渐左倾。卅七、八年间，其主持人胡霖卧病，共党渗透深入报社上下中层，具有灿烂光辉历史的“大公报”，逐渐沦为没有灵魂的应声虫（曾虚白，1966：466）。

这一时期台湾大众传媒对二者形象的塑造也遵循了这两条原则，这其中首推《传记文学》。该刊创刊当年便发表了王军余的《追念同学张季鸾君》，此后又陆续发表了吴相湘、于衡、郭学虞等人的文章，甚至将陈纪滢所作三万余言之《一代论宗哀荣余墨》分两期连载，足见对张的重视。1976年6月，该刊将张季鸾定为当月专题人物，组织了11篇文章，其中既有程沧波、曾虚白、刘光炎这样的政府高级宣传主官，也有成舍我、胡健中、陈纪滢、陶希圣这种曾与张有过过从的老报人，还有杨尔瑛、沈云龙之类的学者，可谓面面俱到。这些文章也无一例外地延续了“拥蒋、反共”的论调。如杨尔瑛（1977）认为张正是“站到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这一边……所以他的言论能够在社会上领导群伦，影响社会。”刘光炎（1977）则

认为张如果迟死几年,“政府应付共匪不会那么困难。”

如此,张季鸾与《大公报》“拥蒋”“反共”的形象,便在50-70年代的台湾社会特别是传媒行业中树立起来,由于曾虚白等人又大多是各主要大学的新闻系教师,所以这种形象塑造也对当时的学生们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毕业于政治大学的皇甫河旺(1968)在《张季鸾之生平及其影响》中云:

季鸾先生始终本独立报人之操守,以尽文人报国之责。《大公报》的诸方面成就固然赖于全体同人的努力,然而自始掌舵历险,代表《大公报》在社论中因忧国忧民而呐喊的,实由季鸾先生亲自领导。当然,吴、胡、张三人通力合作,也是《大公报》成功的因素。

季鸾先生由报恩为出发点的爱国思想,在国难当前,时局紊乱之时,充分地表现出来,……他痛恨破坏国家统一的特殊势力,不低于侵犯我国独立自由的侵略力量;痛恨蛊惑青年蹂躏科学教育的共产党,不下于卖国求荣的汉奸。他虽然绝意仕途,只一度参加同盟会以后就不党,但是他十分同情革命及统一的进展,竭力拥护政府与领袖。

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程菁(1977: 62-63)在谈到“九一八”后《大公报》言论时亦云:

(“九一八”后全国要求立即抗战的舆论)无形中给予中共宣传的绝好时机。中共乃假对日宣战的美名,不断地攻击国民政府,并污蔑总统蒋公态度软弱,甚至诽谤政府当局没有爱国心,拒绝从事抗日战争。中共更摆出爱国姿态,巧妙地利用国人愤激的情绪,使许多人醉心于空言抗日,而疏忽于剿匪及建国。在这种情况下,张季鸾领导的大公报社评,始终坚守其“不盲”的誓约,“从没有一天以言论压迫政府主战,也从没有附和一部分人年来所谓即时抗战论”。

总之,由于张季鸾所具有的“独立”、拥蒋、反共、亲美的特点,使他在50年代文化冷战高潮的时期同时符合了美国政府与蒋政权的需要,从而成为了台湾大众传媒业最重要的榜样。在政府的“统制”与“引导”下,这种针对新闻院系学生的形塑,应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台湾社会的发展,这种形塑开始逐渐偏离了官方主导的轨道。

## 二、呼吁“维护民权”与要求“新闻自由”：70-80年代官方形塑的转型

1970年代的台湾可谓风云激荡。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翌年2月28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正式发表；这标志着中美开始走向和解与联合，也意味着台湾在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中地位的转变。就文化领域而言，美国开始大幅减少对台援助与拨款，转而将之投向大陆或与之相关的领域，以此前美国民间对台文化交流援助的主力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例，1970年代初期，该会“对台湾的援助项目愈来愈少”，这一方面当然由于台湾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学术文化的研究拨款转向大陆<sup>1</sup>，亦可看出‘铁幕中国’的意象已打破，文化上的冷战已先于军事和政治上的冷战中解冻出来。”（吴翎君，2012：130）

但是，文化冷战虽已在台湾地区降温，它的影响却决非一天可以消除。在此之前，台湾当局一直将自己打造成“自由、民主、人权”的代表，以与所谓“暗无天日”的大陆地区形成对比。经过20多年的不懈宣传，这些理念在台湾早已深入人心，而这却与长期实行“戒严”体制的台湾现实社会产生了鲜明的反差。面对着事实上破灭的“反共抗俄”的梦想，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戒严体制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质疑，来自民间的要求终止这种非常体制，尊重民权的呼声逐渐高涨。同时，长达1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造就了大批“中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很富裕，又受到良好的教育，在社会上非常活跃，政治意识强烈。他们把参与政治看作是现代公民资格的组成部分，毫不犹豫地诸如人权、经济犯罪、出版自由、政治多元化、空气污染和交通堵塞等问题上畅所欲言。国民党的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徐中约，1970/2002：946）以1977年11月的“中坜事件”为始，民间自发的抗议活动日渐频繁，规模也逐渐扩大，“党外人士”开始走向联合，国民党威权体制的基础逐渐动摇。

更重要的变化来自新闻界自身：经过20余年的筚路蓝缕，《联合报》与《中国时报》已经发展成两个庞大的报团，“在利益的驱动下，报纸内容中出现了‘新闻广告化’和‘广告新闻化’的现象。……这些不顾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做法，让一些不良广告趁虚而入，使这一时期报纸内容良莠不齐。”（陈扬明，陈飞宝，吴永长，2002：94）美国崇尚“独立、自由”的新闻思想对台湾本就影响深远，而这种崇美的意识在这一时期被更加强化了——面对各主要国家纷纷与自己“断交”的现实，急需靠“国际承认”证明统治合法性的台湾当局更要紧紧抓住美国这根救命稻草。而一向将大陆斥为“黑暗”“专制”，而标榜自己为“自由中国”的台湾当局，事实上却“既以西方资本社会的新闻自由作标榜，同时又从事种种新闻管制。”（高郁雅，2003）传媒从业者一边在报上大肆宣扬台湾的“自由”“民

主”，一边却要忍受来自政治与商业的压力，其内心之纠结与痛苦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自70年代中期起，张季鸾及《大公报》虽仍是台湾地区传媒业者推崇的主要榜样，但其形象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形塑的中心取向由强调“拥蒋反共”转向强调其“呼吁民权”及要求“新闻自由”。

这种变化首先是在官方既有的轨道上悄悄发生的。如这一时期台湾新闻史研究的主将赖光临先生在其1972年发表的长文《张季鸾办报之事功研究》中，虽然也谈到“张氏对蒋总统具有高度敬仰，确认他是‘中国近世最杰出的人才’”，但对“反共”却只字未提，却辟专节论述其“强调革新政治保障民权”及“崇尚言论自由”（赖光临，1972）。而前述《传记文学》组织之张季鸾专号，邀请曾任《中央日报》总编的著名报人卜少夫出席，卜以与张鲜有往来为由推脱不成，乃于9月交来一稿，此稿对“拥蒋”“反共”等只字不提，仅称赞张“不仅反映了民情民心，更领导了舆论”，“文章往往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南箴。”（卜少夫，1977）而用很大篇幅谈到了“新闻自由”的问题：

凡是民主国家，莫不尊重新闻自由，这也是从事于大众传播这一工作的人所奋力争取的，可是放眼全球，有几个国家真正实践了新闻自由？这其间当然有处境不同的关系，如大敌当前，面临战争状态，或内部政治情况动乱，在舆论上不得不加以约束，从国家利益立场出发，无可非议，倘使为了便于个人统治，维系私人既得利益的政权，实施此种独裁手腕，封锁悠悠之口，无论用什么理由作借口，永难为人民所心服，不幸的意外，随时可爆发的。

张季鸾先生时代如此，今日更甚，新闻自由实际上是全人类所追求的目标，并非只是新闻从业人员专属的一项奋斗的目标。张季鸾先生在他的一生记者生涯中，即使利用他的特殊背景，特殊机遇，他所遵循的路线，以及表现在他所完成的业迹的精神上，何尝脱离新闻自由？何尝背弃新闻自由，他的苦心我们后人应该充分理解的，我们更应理解的，如果“只有季鸾先生有新闻自由”。或是“新闻自由只限于季鸾先生专利专享”。那么，这个民主政治是不健全的、畸形的、残缺的。

如此，在7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张季鸾与《大公报》的形象开始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如果说对二者舆论地位及其所主张的“四不主义”的推崇是一以贯之的话，那么这时的目的却已经改变：70年代之前的目的是服务于“拥蒋反共”的中心，因为此二者在历史上对蒋政府的拥护乃是人尽皆知的事实，那么既然如此“不党不私”的著名报纸与报人都心心以“拥护党国”“拥护领袖”为念，那么“党

国”的正义和“领袖”的英明；“野心者”的卑劣和“共匪窃国”的非法，自然也就不言自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季鸾及其所主持的《大公报》越“独立”“无私”，越“领导舆论”，便越能证明蒋政府统治的正义性。这时的目的则转而为“呼吁民权”和“要求新闻自由”的新的中心服务，因为既然“不党不私”的《大公报》可以在历史上取得如此成功，那么当下的台湾也应该有一份“不党不私”的报纸；既然“领导舆论”的张先生都如此推崇民权与新闻自由，则足见保障民权与新闻自由之重要与深入人心，其潜台词直指当时台湾当局实行的戒严体制与“报禁”政策。

这种转变在70年代后期逐渐成为了形塑张季鸾与《大公报》的主流取向。仍以赖光临先生为例，他认为：“对于维护民权，张氏可说是大声疾呼，他依据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解释人民与政府之间是属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关系。”（赖光临，1987：615）并引述张历史上的《贡献于审查委员会》、《望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等社评，加以评述分析，从而凸显张对保障民权的重视。而对言论自由的呼吁，则更是他所着力论述的一个方面。对于张的新闻自由理念，赖光临认为：

张氏崇尚自由主义，肯定言论自由的积极价值，他认为政府奖励言论自由愈早，所灭除社会危机愈多。国家处于紧急时期，有“不得已及必要之理由”，限制言论自由，但应限于最重大的事项，如破坏国体，妨碍国防，扰乱公安秩序的宣传等。“取缔的标准应极狭，开放之范围应极宽。”

他对言论自由，另提出一项重要观念，强调责任。“凡有关国家大事之言论，其本身皆负有严重责任。”言论自由为立宪国民必需之武器，然不知用或滥用，则不能取得（赖光临，1981：119）。

在赖看来，张季鸾对于言论自由的态度，乃是源自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近代西方兴起不久的社会责任论暗合却又有超出之处：

张季鸾标揭的言论自由，一方面含寓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一方面又具有近代社会责任论观念。而社会责任论（Theory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着重核查传播事业的作为，强调自由与所连带的责任俱来；报纸在宪法保障下有着一种特权的地位，因此有义务来完成大众传播的主要功能，以对社会克尽责任。这份观念与张氏的责任观念，在出发点上则多少有所不同。西方社会责任论倡于廿世纪中叶，针对新闻事业滥用新闻自由而发，基于权利与义务相对待，因而呼吁课以责任。张氏的责任观念，则是报人基于对国家的忠诚，自觉地对工作产生

一份庄敬之心，表现了一份崇高的国士精神，显然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赖光临，1981：119-120）。

如此，在台湾新闻史学界，张季鸾与《大公报》的形象便由“党国诤友”“反共斗士”转变为了“民权卫士”和“自由先驱”。这一形象与当时台湾“报老板”们对新闻行业的想象高度契合，“无论是王惕吾、余纪忠、吴三连或吴基福，他们都具有颇深的人文修养与关怀，有担当，也有大气度。他们出身不同，但都拥有传统知识份子的志气，一心一意要办份‘不党、不私、不卖’的报纸！”（朱立，2008：10）如此，对当时的台湾大众传播业者而言，“专业人员与初学者”和“师傅带徒弟”便达到了相辅相成，所以这一时期对张季鸾与《大公报》的形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那一代台湾传媒业者而言，张季鸾、《大公报》、“文人论政”“四不主义”等概念成为了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台湾报业追求的最高价值”。（王健壮，2014：序言17）这种形象深深地植入了他们的记忆，甚至在几十年后仍未消退：创办《天下》杂志的著名记者殷允芃在2007年接受访问时直言张是“报人的典范”，“四不主义”“是最简单扼要的媒体准则。”（殷允芃，2008：267）著名华人传播学者李金铨先生也在2015年8月举行的一次张季鸾专题研讨会上称赞“《大公报》是近代中国报业史上‘文人论政’的最高峰。”（李金铨，2015）而资深报人王健壮（2014：序言23）则这样深情地谈到张季鸾对他的影响：“我生也晚，无缘得识张季鸾，但对他的文章他的故事，却从年轻时就略知一二，用流行语来说，我早就是他的隔代‘粉丝’。”

这种形塑的成功，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如前所述，70年代中后期的台湾，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民权思想开始兴起。1949年后国民党在台湾通过“戒严”等一系列手段建立起了自己的专制统治，但仍留下了许多缝隙：首先是选举，根据1947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台湾地区的各县市长以及“立法委员”等职务，皆由民众直选产生，这就给“党外人士”留下了进入政坛的空间；其次是杂志，“戒严体系”下的台湾严格实行“报禁”，但对杂志的控制却相对宽松，这就给“党外人士”批判国民党政权、宣传自己的政见敞开了大门。以1975年8月康宁祥、黄信介创办《台湾政论》月刊为起点，一大批“党外杂志”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诞生，虽屡遭查禁，却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成为了“唯一能传播反对派观点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淡宁，1992/1995：288）这些“党外杂志”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专制，要求保障民权，呼吁自由民主，凡此种种，都与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者所塑造的张季鸾与《大公报》的形象完美的契合，所以这

一时期有关二者的形塑才能如此深入人心。在他们心目中，那个素未谋面的陕西人和他的那张报是一个高山仰止的偶像，一个见贤思齐的目标，一个永远追求的理想——这是一种书生臧否天下事的豪迈，布衣亦可傲王侯的风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执着和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气节。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为了获得美国的支持，也为了证明自身合法性，与“共匪”区隔，台湾当局必须大力张扬“自由、人权”等理念；但为了维护其统治，却又在实际上不断强化其威权体制，而张季鸾由于同时具备符合两方的特质而成为官方着力塑造的大众传媒业者的榜样。但是，“口头上坚持民主理想限制了国民党对新闻的控制能力”，当冷战形势变化使得台湾地位逐渐边缘化之后，伴随着民间与官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党外人士”接过了官方对这一榜样的解释权。他们剥去了它身上原有的“拥蒋”“反共”的外衣，重新发掘并大力张扬其“民权”与“自由”的特质。于是张季鸾和《大公报》又成了他们的武器——用来批评和反抗现政权，要求打破桎梏，呼唤“公正无私”“不偏不党”的报纸再现于今日的武器。而张季鸾这一维护蒋政权的卫道士，也变成了“党外人士”们的护身符。“新闻界的人士利用了体制中存在的这些缝隙，他们钻到这些缝隙中，逐渐扩张它们，直到把旧躯壳胀碎”。（包淡宁，1992/1995：205）80年代末台湾威权体制的解体，不能不说与这种转变有着一定的关系。

### 三、从抗争到遗忘：“解严”后传统形塑的消解

1987年3月20日，适值张季鸾百岁冥寿，《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发扬张季鸾先生的办报精神》，这也是该报历史上惟一一次以张季鸾为主题发表社论，此文开篇即云：

今天是我国名报人张季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当此世局迷惘，国难未艾，世人对共产邪说所造成人类空前浩劫的严重性，不仅未能十分正视，而自由世界姑息主义者反而推波助澜，致使共党统战阴谋祸害日甚一日之际，对于这位一生秉持正义，针砭邪说，深具爱国情操的伟大报人，我们有无限的追思与崇敬（中央日报，1987）。

文章认为张“终其一生是国民党最诚挚的党友”，并回顾了他“坚守文人论政的理想”与“全凭一股爱国报国的情操”的办报生涯，盛赞其由于坚持“四不”理想，“故能克尽报人天职，备受海内外景仰，并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赠荣

誉奖章，为我国报业树立典范”，文末呼吁：

先生爱国忧民，廓然大公的情操，实源于其忠诚善纯之本性。其“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的报恩理念，看似迂浅，实则高贵。心怀报恩之志，则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没有权利之想。人人能以责任为重，用以办报，必能善尽报业的社会责任，导引民众走出是非不明、义利难辨、善恶莫分的迷惘，尤其在国家遭遇横逆困难之际，我们确实需要有张季鸾先生的办报精神，发挥舆论功能，指导民众不为时势所迷，不被环境所惑，认清国家目标，完成时代使命（中央日报，1987）。

同日，台湾“中国新闻学会”也在台北“中央图书馆”举行包括“总统府资政”黄少谷、“中华电视公司”董事长易劲秋、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即原“第四组”）主任戴瑞明以及台湾新闻学界泰斗李瞻、徐佳士等“六百位左右的大众传播界、历史学界人士参加”的张季鸾百年诞辰纪念会，新闻学会理事长楚崧秋主持会议，蒋介石“文胆”“中华民国历史学会”理事长秦孝仪（1987）发表主题演讲，回顾了张与蒋介石合作无间的经过，并特别指出张“对于中共匪党的罪恶本质，认识最为透澈”，盛赞张“光明伟俊”，是“‘国民报国’的典型”，并呼吁大家以张为榜样，“以‘一等国家’‘一等国民’‘一等报纸’‘一等记者’‘一等大众传播’相勉相期。”（秦孝仪，1987）

1990年9月22日，文工会又在台北举行“报人典范——张季鸾先生研讨会”，楚崧秋主持，李瞻、王洪钧、郑贞铭提交论文，皇甫河旺、赖光临、石永贵等与会，并特别声明此次会议“欢迎各界人士踊跃前往参加。”（中央日报，1990）对于此次研讨会的宗旨，楚崧秋（1991）开宗明义：

我国报业史上有不少名报人和评论家，如就志节、远见、贡献与影响而言，在民国一、二十年代，以办大公报而名噪一时的陕西榆林张季鸾先生，恐怕要算第一人了。……（举办研讨会的目的）一方面固在缅怀先哲，见贤思齐，同时更有见于目前国内新闻界颇显紊乱现象，大家如能对张先生的人格风范、报业思想与办报方针有多所了解，相信又有助于乱象的导正与澄清。

会议围绕楚崧秋提出的“志节高尚、报恩主义”“坚守岗位、专业精神”“无私无我、恪守道德”“文人论政、报业典范”“热爱国家、鞠躬尽瘁”五个论题进行了讨论，从会议的记录来看，讨论并不甚热烈，特别是由现场听众参与的“综合

讨论”环节，只有一名听众提出了希望建立“张季鸾先生纪念馆”的问题，不能不说显得有点冷冷清清。

然而与这种冷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央日报》的大造声势。会议次日，该报便将李瞻先生的论文全文发表在《副刊》版；29日，又将所有论文及讨论发言全文发表，并配《张季鸾言论选粹》，整整占了两个整版，这在战后台湾张季鸾研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

非常之事，必应非常之时。这三年对于台湾来说，是风云诡谲的三年：1986年9月28日，以“台湾独立建国”为诉求的“民主进步党”成立；次年7月14日，“总统”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11月2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大陆老兵返乡探亲；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突然去世，岛内“强人政治”就此终结，“没有枪，拳头又小，在国民党里头也没有派系”（司马辽太郎，1994/1995：537）的台籍“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为了尽快获取并巩固权力，“包括李登辉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逐渐在政治博弈中采用了以台湾本省人为诉求对象的民粹主义策略，以此来获得政治博弈中的战略优势。”（郭中军，2014：113）于是，“当年的警总、新闻局、文工会针对新闻个案管制，但民进党的一句‘统派媒体’，则是全盘否定及灭杀新闻媒体的民主宪政角色。”（黄年，2008：491）而就新闻业自身而言，“解禁”本来是件有利于报业发展的好事，但“在这个紧要关头，管制者却未能建立合理的游戏规则。于是，台湾报业在此时错失转机、改变的良机，也没有改进体制。”（林丽云，2009：184）“联合”“中时”两大报系迅速攻城略地，“三年内，两大报团在广告与读报市场的占有率上，迅速由七成增加到八成。”（林丽云，2009：185）许多老牌报纸纷纷倒闭，台湾报业市场的寡头垄断格局已经形成，办报成为了富豪们的游戏，报界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在这种形势下被进一步地强化了。

凡此种种，都使当时仍在执政的国民党政权内部的部分人士以及新闻学界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所以他们在这三年间频繁高调举行纪念仪式，其中别有深意。

“传播的仪式观强调参与、分享、联合以及拥有共同的信仰，并不是信息在时空意义的扩张，而是在时间意义上对社会的维系，不是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Carey，2009：15）当这些官员和学者们济济一堂举行纪念张季鸾的仪式的时候，他们便是在共享自己关于新闻事业的信仰——报恩主义、专业精神、无私无我、文人论政、热爱国家——这些信仰曾经那么完美地体现在张季鸾和《大公报》身上，并且非常成功的激励过几代台湾报人之为奋斗。他们希望通过这种仪式和报纸的宣传，重新唤起当下传媒业者对这些信仰的重视，以对抗过度商业化与

“台独”侵扰，正如时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的林东泰（1991：266）在发言中所指出的：

季鸾先生主张不卖，无非是要求办报的人，要有理想、有抱负，要有悲天悯人的心怀，不应急功近利，只是一心一意想赚钱。可是让我们环顾整个报业环境，甚至整个传播环境，那一个不是汲汲营营于赚钱、销数，或收视率，而为了销数和收视率，各个新闻媒体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恶性新闻竞争，只要新闻有卖点，则愈冲突愈煽情的异常事件，成了新闻媒体的最爱，谁还想到社会责任？

季鸾先生主张不盲，无非就是要求新闻媒体在新闻报道和评论时，能够坚守公正客观立场，不盲从、不附和。……固然我们现在拥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即使高谈阔论台独论调，也不违法，但是问题在于不违法的事情，新闻媒体只要秉诸良知，即使不违法但是很可能伤害国家和人民福祉的，则应采取相当程度的保留，而不是又把它当作一个新闻卖点来处理。

这些发言，即是切中时弊的真知灼见，更是面对社会逆流的勇敢抗争。但是正如伯克所指出的，他们忽略了“过去与现实的区别”，他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个“过去”，恰恰是当时的人们所不愿了解的，“哪怕这可能对他们有益”。（Burke，1997：59）在商业利益和政客煽动的两面夹击下，他们的抗争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再加上“报禁”解除后，至少从表面上看来，“新闻自由”和“保障民权”的要求都已实现，张季鸾和《大公报》作为武器的作用也已失去。商业化的泛滥使得难以“来钱”的历史学逐渐乏人问津，新闻史研究在台湾渐趋没落（潘家庆，2009），再加上“台独”思潮的影响，于是，张季鸾和《大公报》逐渐被打入了冷宫，除了王洪钧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学者报人之外，他们逐渐淡出了新一代台湾新闻史学者的视野<sup>2</sup>。那个曾经激荡了几代报人的偶像，就像一颗流星，从新闻业的天幕中缓缓坠落，只留下了长长的尾巴——王健壮、李金铨等报人学者对那个时代的追思。

#### 四、结语

通过前述梳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战后台湾社会对传媒业榜样形象形塑与传媒业自身及社会环境之间互动的轨迹：战后初期，在以“反共”为第一要务的文化冷战的大背景下，为了维护政权，解释其合法性，张季鸾和《大公报》以其独特的优势成为了台湾当局为新闻界着力塑造的榜样形象。这种塑造首先来自于曾虚白、

程沧波等人，他们往往具有三重身份：首先是与张有过交往的老报人，其次是国民党当局高层宣传主管，再次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主要教师。他们塑造的张及《大公报》“党国诤友”“反共斗士”的形象，通过文章、教科书、课堂等形式在学生群体中实现了较为有效的传承。而就当时台湾传媒业的表现来看，“拥蒋反共”也成了这一时期的主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形塑的成功。但古典威权统治下的台湾，社会的一切都严格按照政府的设计运转，凡有敢越雷池者必遭严惩，传媒业的这种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在政府高压下的“被迫的同意”（Femia, 1987: 36），在这种局面下，鲜有人敢做仗马之鸣，台湾传媒业近乎一潭死水，即偶有微澜，也很快平息，故这种形塑难说真正成功。

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进入改革威权时期，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逐渐放松，李瞻、赖光临等来台后第一代大学生接过了对这一形象的解释权。他们与张没有交往，与当局的关系也不甚密切，又大多受到了美国新闻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的解读下，张与《大公报》的形象转变成了“民权卫士”与“自由先驱”。这一形象契合了当时社会的要求和传媒业者对新闻事业本原的想像，所以在台湾传媒业者心目中取得了高度的认同，这种认同是一种“心理状态”，它来自于“对同意的要求或多或少的确证和正确的信仰。”（Femia, 1987: 36）从这一时期传媒业的表现来看，这一形象成为了业者追求的最高目标，而这一目标也激励着他们在台湾社会的转型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一时期的形塑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解严”后，随着传统威权体制的解体，原来由政府主导形成的一元化的形塑也开始逐渐消解，经济利益的冲击使得历史学逐渐边缘化，“民主化”的实现使得“民权卫士”“自由先驱”的形象不再具有现实需要，再加上“台独”思潮的冲击，凡此种种，都使得这一符号开始被传媒业者遗忘。面对这种局面，早先的塑造者们进行了抗争，但最终失败。随着台湾社会民粹威权统治的逐渐形成，在政治煽动与商业利益的两相夹攻下，这一符号也逐渐淡出了台湾社会的视野。这一时期台湾传媒业对这种形塑的“同意”，更多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同意”——在“去中国化”和商业利益至上成为新的“政治正确”的局面下，从业者“很少遇到拒绝或更正的状况”（Femia, 1987: 36），在这种局面下，台湾传媒业乱象横生，“戒严报禁时期，媒体是统治者的侍臣、政治的打手，虽然媒体工作气氛肃杀，但他们觉得至少当记者有尊严；现在自由了，专业却受到践踏，他们反而人前羞提自己是记者。”（陈世敏，2008：前言5）这种形塑成功与否，自不待言。

另外我们还需要特别指出一点：就台湾地区对张季鸾与《大公报》的形象塑造发展的历程来看，无论是50-70年代的“党国诤友”“反共斗士”，还是70-80年代

的“民权卫士”“自由先驱”，都是片面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些记忆，都是时人出于自己以及时代的需要，将二者历史上的某个侧面加以强调，同时刻意淡化、忽略甚至隐瞒其他侧面所形成的。近年来，随着大量史料的不断解密，也随着社会环境的逐渐宽松，这些以前不为人知的侧面也逐渐显露出来。对于这一问题，台湾的新闻人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王健壮便认为，以“四不主义”来严格检验的话，“张季鸾虽称得上是报人，却并非是完美的报人。”（王健壮，2014：序言19）不知不觉间，在大陆学界与民间，张季鸾与《大公报》近年来也成了热门话题。几经辩证，对此研究已近全面、客观。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台湾相关历史的回顾，如能于大陆当下有所鉴易，则幸甚至矣！

（责任编辑：胡宏超）

### 注释 [Notes]

1. 原文此处作“中国”，将台湾与中国并立，当为作者政治态度所致，笔者将其改为“大陆”。
2. 根据笔者在华艺在线等台湾地区主要数据库中以“大公报”“张季鸾”等为关键词检索得到的结果，在2000年以后，台湾地区相关成果（仅计算署名单位在台湾地区的作者）仅有期刊论文6篇及硕士论文1篇，且均在近代史领域，如林宏一：《远眺密支那：〈大公报〉报道中的密支那战役》，《政大史粹》2005.12；刘羿颖：《〈大公报〉在国共内战初期立场之研究（1945.12-1947.1）》，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等，如果以新闻史或新闻学计算，则告阙如。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A·班杜拉（1997/2003）。《自我效能：控制的实施（上）》（缪小春等译）（第1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包淡宁（1992/1995）。《笔杆里出民主——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李连江译）（第1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
- 保罗·康纳顿（1989/2000）。《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第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卜少夫（1977）。张季鸾先生座谈会后。《传记文学》（台北），（9）。
- 陈俊斌主编（2008）。《黑暗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陈世敏（2008）。《前言：为了见证历史》。载卓越新闻奖基金会（主编），《关键力量的沉沦——回首报禁解除二十年》。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陈扬明，陈飞宝，吴永长（2002）。《台湾新闻事业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程菁（1977）。《大公报对抗战国策言论态度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组硕士论文，台北。
- 楚崧秋（1991）。《主席致词》。载文讯杂志社（主编），《知识分子的良心：连横、严复、张季鸾》。台北：文讯杂志社。
- 高郁雅（2003）。《1949年中国报界的政治转向》。载天主教辅仁大学历史学系（主编），《天主教辅仁大学历史学系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天主教辅仁大学历史学系。
- 郭中军（2014）。《台湾地区民主转型中的民粹主义（1987-2008）》。上海：学林出版社。
- 哈耶克（1944/1997）。《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第1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皇甫河旺（1968）。张季鸾之生平及其影响。《新闻学研究》（台北），（13），151-178。
- 黄年（2008）。黑金政治的命名者与批判者。载陈俊斌主编（2008）。《黑暗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第468-493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赖光临（1972）。张季鸾办报之事功研究。《报学》（台北），（12），101-117。
- 赖光临（1981）。《七十年中国报业史》。台北：中央日报社。
- 赖光临（1987）。《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下》。台北：商务印书馆。
- 李金铨（2015）。回顾《大公报》和张季鸾的文人论政。《新闻记者》，（11），44-48。
- 林丽云（2009）。《变迁与挑战：解禁后的台湾报业》。载卓越新闻奖基金会（主编），《台湾传媒再解构》。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刘光炎（1952）。抗战期大后方新闻界追忆。《报学》（台北），（1），126。
- 刘光炎（1977）。一个新闻工作者对季鸾先生的印象。《传记文学》（台北），（6）。
- 莫里斯·哈布瓦赫（1992/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第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潘家庆（2009）。新闻史研究的困境。《国际新闻界》，（4），9-11。
- 秦孝仪（1987）。“国民报国”的典型——光明伟俊的张季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中央月刊》（台北），（4），47-49。
- 司马辽太郎（1994/1995）。《台湾纪行——街道漫步》（李金松译）（第1版）。台北：台湾东贩股份有限公司。
- 孙泊（2016）。《道德榜样论》。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论文。苏州。
- 孙代尧（2003）。《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第1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文讯杂志社（1991）。《知识分子的良心：连横、严复、张季鸾》（第1版）。台北：文讯杂志社。

- 王健壮(2014)。《凯撒不爱我: 追寻新闻人的自由传统与典范》。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吴翎君(2012)。冷战初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台湾的援助。载贵志俊彦, 土屋由香, 林鸿亦(主编), 《美国在亚洲的文化冷战》(李启彰等译)(第109-131页)。板桥: 稻乡出版社。
- 吴相湘(1964)。张季鸾先生。《传记文学》(台北), (9)。
- 向芬(2017)。冷战时期的两岸文宣——一种学术史的回顾与检视。《新闻记者》, (7), 73-81。
- 徐中约(1970/2002)。《中国近代史·下》(计秋枫, 郑会欣译)(第1版)。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杨尔瑛(1977)。季鸾先生的思想与轶事。《传记文学》(台北), (6)。
- 张道藩(1954)。略述民生主义社会的文艺政策。《文艺创作》(台北), (37), 8。
- 曾虚白主编(1966)。《中国新闻史》。台北: 商务印书馆。
- 中共中央马恩列著作编译局(20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精装版)。北京: 人民出版社。
- 中央日报(1987年3月20日)。发扬张季鸾先生的办报精神。《中央日报》, 2。
- 中央日报(1987年3月21日)。新闻学会纪念张季鸾百年诞辰, 秦孝仪推崇为国民报典型。《中央日报》, 2。
- 中央日报(1990年9月21日)。张季鸾研讨会明在文苑举行。《中央日报》, 3。
- 周葆华, 龚萌菡, 寇志红(2014)。网络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意识——“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之二。《新闻记者》, (2), 56-62。
- 周葆华, 查建琨(2017)。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新闻与写作》, (3), 17-23。
- 朱立(2008)。这是本有意义的好书! 载陈俊斌主编(2008)。《黑暗中寻找星星——走过戒严的资深记者生命史》(第9-12页)。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Peter Burke(1997).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James W. Carey(200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Revised Edition)*.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 Press.
- Joseph V. Femia(1987). *Gramsci's political thought: hegemony,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eece D.J. & Pisano G. & Shuen A.(1997).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8(7), 509-533.